

# 思而不学多疑义,只学不思泯是非\*

——访李竞能教授

**【人物简介】** 李竞能,1927年12月出生于广州,195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1952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创立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任所长至1993年。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第一个人口经济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同年获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1988年秋至1989年末曾在美国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东西方中心从事研究。1981年以来经常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多次参加联合国人口专家研讨会、国际人口科学联盟19~23届大会,曾任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第23届人口大会国际组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经济组评议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至四届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为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从1980年起先后参与主编《人口学概论》、《人口经济学》、《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口丛书》等教材和专著;主编《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和《天津人口史》等;并在国内外发表《中国人口城市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研究》、《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控制》、《亚太地区人口、农业粮食保障和乡村可持续发展》、《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等论文80余篇。1999~2001年又独自完成和出版《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人口经济理论研究》和《人口理论新编》等著作。

**李建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在您的诗集《游子吟》中,有一首诗写到“智者欲先天下忧”,这是不是您当初从经济学说史研究转向人口问题研究的一种心情写照呢?

**李竞能(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可以这么说。虽然我在7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研究人口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早在1956年我就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着手出版一本论中国人口问题的书。然而,不久就身受批

判,在人口经济学研究禁区只能三缄其口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在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形势下,人口经济研究的禁区被打破了,人们不得不正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口和严重的短缺经济,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研究方向从经济学说史逐步转向人口理论和人口经济研究。

**李建民:**您在《人口理论新编》的作者自序

\* 受《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的委托,要我对李竞能教授进行一次访谈。好在我是他的学生,平时就有着许多学术上的交流,所以应承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我对先生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但是,在我与先生的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发现在以往与先生的交流当中,还是忽略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这次访谈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把其中一部分讨论内容记录在此。先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吟诗写赋。这也使我得以偷一点懒,把先生一篇诗作中的一句拿来,作为本次访谈录的题目。——李建民

中曾谈到,这本书虽然与刘铮教授担任主编、您担任副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一脉相承,但主要反映的是您个人的学术观点。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本书中的新观点。

**李竞能:**概括来讲,我在《人口理论新编》中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打破以往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石的理论体系,建立了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理论体系。其主导思想已经由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相适应的理论,推进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我所做的研究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与主体,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人口理论体系。我在书中阐述了人口作为人的社会群体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心主体地位,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和区别,并试图建立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型。第二,力图阐明人口发展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揭示人口发展各个主要方面的运动规律,特别着重阐述了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变量及其内在关系的原理、人口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及其变动的原理、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基本原理、人口城市化的基本原理、人口社会经济构成及其变动的原理等,弥补了以往人口理论著作在基本原理论述上的不足。第三,尽可能收集、补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发展的新资料 and 人口理论的新观点,力求对人口理论的论述赶上世界现代水平,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分析,以加深对基本理论的认识。第四,力图正确体现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三者的关系,即人口理论研究是主体,实证研究提供论据,对策研究体现应用。

**李建民:**您刚才提到,《人口理论新编》打破了以往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石的理论体系,建立了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理论体系,可否就此谈一下您的思想发展轨迹?

**李竞能:**我认为不论是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其基本点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人口的现代化和人口的优化。但是,这两个理论体系的视野是不一样的,着眼点也不太一样。“两种生产理论”比较多

地着重于物质资料生产角度上,其视野比较窄,而且容易引起一种我们已经犯过的错误,比如要人口再生产去适应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甚至要把人的再生产当做物的再生产来管理。1983年出版那部由张纯元教授任主编、我们几个人任副主编的《人口经济学》,其主导思想就是“两种生产理论”,而“两种生产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际上,该书的着眼点是放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个主题思想,就是“人口经济效益”,因为人口与经济适应不适应总得有个标准。后来到编写《人口理论教程》的时候,我又把这个观点修正为“最优人口经济效益”,并把这个观点作为主导思想,并系统阐述了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内涵和衡量方法。现在看来,它比较偏重于经济。当然也谈到人口和资源、环境等方面,比原来的两种再生产理论扩大了一点,但还是比较粗浅。如果从西方学者的角度看,这本书叫做人口经济学有很大欠缺,因为没有涉及生育经济学这个人口经济学最关键的内容。但当时来说,它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学科空白。该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明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我比较主张从两个角度来建立人口经济理论体系,从宏观角度来说,一方面要说明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起什么作用,但反过来,也应该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提出什么要求,提出什么战略目标。这两方面都要考虑,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从微观上说,那就特别需要运用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的观点,包括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等理论来分析这种人口变量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但是,这样还不够,最终还是要要把这两者综合,归结到人口转变理论上。我认为,一部学术著作不仅要把过去的东西概括起来,还要有前瞻性。当时我们提出的“人口经济效益问题”现在看起来就有一定的前瞻性,它与可持续发展挂起钩了,如果是“两种生产理论”就很难挂钩了。

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视野要比“两种生产理论”的视野广阔得多,一方面是其战略目标比“两种生产理论”的层次要高;另一方面,它不

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而是把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都加进来考虑。其实,早在80年代末,我就开始关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1989年在美国斯坦福人口、资源、环境国际研讨会上,我曾经从人口可持续发展角度论述了中国人口增长和滥伐森林、水土流失问题,建立了一个分析人口—粮食—耕地—森林—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从1992年到1994年,我曾在国际研讨会上,多次提出对西方流行的 $I = PAT$ 的理论模型<sup>①</sup>的批评与修正意见,提出了修正公式: $I = PAT/SRe$ (李竞能、徐斌,1996),其中S是制度因素,特别指资源和环境的管理及其效率,Re指资源的再造或再生能力。因为在分析环境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时,除了人口、消费和技术等因素外,应当重视制度因素、制度创新的作用。在1995年前后,我开始系统地研究和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别是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非可持续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熵”废料问题<sup>②</sup>。实际上,事物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在《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和《人口理论新编》中都阐明了这个思想,即凡是从古至今延续生存、发展到当代的事物都有可持续性,否则不可能长久存在;可持续性的存在,特别是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存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存在可持续性并不等于存在可持续发展。许多事物自古以来就存在可持续性并不等于自古以来就存在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才产生的战略思想。

**李建民:**就我所知,人们曾对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有过争论,也有学者曾经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展开过争论。您如何理解人口可持续发展?

**李竞能:**如果仅仅把人口理解为人口的数量,人口可持续发展当然无从谈起。但人口不仅仅是数量,它还有许多社会规定性,而且,社会的规定性才是人口的本质。从人口的社会规定性出发,就存在着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在《人口理论新编》中专门阐述了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即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而人口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此可以推论,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同理,既然人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主体,那么,人口作为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也可以被看做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主体。应当指出,由“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和“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命题,推论出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主体,是有条件的,只适用于把人口理解为人在社会群体的范围之内。

**李建民:**在两种再生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我们是不是都可以见到马尔萨斯的影子?只不过在“两种生产理论”中,老马尔萨斯主义色彩更浓一些,而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色彩更浓一些。

**李竞能:**为什么呢?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因为基本前提是一样的。过去很多人拿马克思的话批判马尔萨斯的时候都忽略了一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马尔萨斯分析的前提是对的。但是,不管是老马尔萨斯主义还是现代马尔萨斯主义,都只是“总人口理论”。从人口理论和人口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只是一条腿,它忽视了人口过程本身变量的关系。人口转变理论就不一样了,它把“总人口理论”和“人口过程内在变量理论”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李建民:**您在《人口经济理论研究》中也提到了“总人口理论”和“人口内在因素理论”,区分这两种理论的意义是什么?

**李竞能:**李政道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讲,

① 该模型也称“环境压力指数”,是1971年由美国学者Ehrlich和Holdren提出的,旨在说明人口数量变化的环境效应。其中:I为环境所受到的负面影响,P为人口规模,A指人均消费水平,T为单位产出由技术所造成的对环境的污染。

② 熵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熵的定律就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是守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们只有形式的改变而没有本质的变化。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序到无序(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1987)。

从物理学发展来看,20世纪是简化、概括的世纪。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精辟。20世纪人口学的发展基本上也是这样,是一个简化、概括的世纪。我提出对“总人口理论”和“人口内在因素理论”的划分,就是力图对西方人口理论发展过程进行概括,也是一种简化。当然“总人口理论”并不完全是我提出来的,西方学者早就提出来了,只是没有像我这样把它系统化而已<sup>①</sup>。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口理论研究从总体上说主要是对总人口变动规律的研究,从马尔萨斯到凯恩斯的人口理论都可以称之为“总人口理论”。而最先深入到人口过程内在因素去研究人口发展的,可能是汤姆森(W. S. Thompson),他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和1930年出版的《人口问题》中,按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不同情况划分了人口增长的类型,而且最先系统地分析了差别生育率尤其是阶级差别生育率。其后的人口理论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等人口过程内在因素的分析上,因此,可以统称其为“人口内在因素理论”。西方人口理论的发展概括起来就是:主流先是“总人口理论”,然后是“人口内在因素或内在变量的理论”,而这两者再结合就变成“人口转变理论”,把宏观与微观都结合起来了。我觉得列宾斯坦(H. Leibenstein)对人口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就在这里,他比较早地,而且比诺特斯坦(F. W. Notestein)更为明确地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并进一步去分析人口内在变量。

**李建民:**人口理论的发展是与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密不可分的,您认为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李竞能:**早在1978年第一届人口科学大会上,我就已经指出,人口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发展问题(李竞能、纪明山,1979),我始终是这个观点,不过后来又扩展了一些,人口问题实质上是发展问题,而且发展的涵义也在不断扩充,实际上有三个层次,即除了人们早已认识到的人口数量增长问题外,还应该包括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完善,现阶段已经演进为协调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人口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的数量、质量、速度、构成等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就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看,有四种基本关系:(1)总人口和劳动力的比例关系;(2)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3)人口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4)人口和积累的比例关系。我们过去的研究虽然也承认人口对经济发展会有促进或延缓作用,虽然也承认人口本身也有它自己的过程和规律性,但实际上却害怕强调这个东西就会走向“人口决定论”,所以总是要提防着。但也有些人认为,不应该怕这个东西,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口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也有决定作用。我不赞成这样一种做法:经济发展比较顺利就把人口问题放在脑后,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就把人口问题当做“替罪羊”。

**李建民:**有学者在分析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赶不上帝国的扩张。

**李竞能:**罗马帝国的情况其实很复杂,《人口理论新编》中讲到可持续性的时候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明说。实际上在罗马帝国的贵族中“男风”很盛,所以很多家族最后很快就没有后代了,就灭亡了。因此我认为,对什么东西的批判都不能过分,比如说,传宗接代思想,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它能不能流传到现在都是个问题,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原民族很多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流传下来?跟这个思想是有关系的。比如我们客家人,跑到哪里都要把宗族流传下来,总体上对宗族的保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注意文化和观念的历史性,不能从某一个角度强调不要多生孩子,因此就否定了传宗接代文化思想曾经起到的历史作用。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都是问题。其实,人口变动并不都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有时经济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是第二位的。经济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常要通过中介因素,比如婚配、教育、生育观等。

<sup>①</sup> 关于总人口理论的阐述可参见 J. J. Spengler(1972), Population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李建民:**从我国恢复人口研究之后,我们基本上是先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然后整个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似乎都是沿着这个理论逻辑做下去的。但是,西方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却是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您认为,我们所进行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与国外或西方的研究相比特点是什么?我们的研究是否走偏了?

**李竞能:**从我国的人口理论发展看,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定性分析,从规律和理论角度来谈,而当时对人口研究很多基础性的工作都没有做。所以,只能够谈理论、谈规律,从这方面体现我们的优越性。但这是不是优越性呢?有一定的优越性,注意到要把一些问题提高到理论、规律、原理的层次上谈。后来才发现,基本上我们的人口学并没有入门,虽然有很多人很自豪,说我们在理论上创立了“两种生产理论”,其实后来慢慢也清楚了,实际上我们对人口学、人口理论所知甚少。所以才开始向西方学习,派人出去,请人进来。在这个阶段重视了调查研究,重视了实证分析。当然,对策研究贯彻始终的。因为就中国整体来说,就是为了对策,为了决策搞研究,始终贯彻的就是这个。但是,从人口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来说,开头主要是定性分析,后来搞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但是又走偏了,两个结合不起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结合好。我认为,这三者之间的恰当关系应该是:人口理论研究是主体,实证研究提供论据,对策研究体现应用。当然,不能把理论变成政策的附庸。其实西方也并不是不注重理论研究,西方在19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初,都比较重视理论研究,只是后来转向了微观的研究,转向了人口内在因素的研究。但实际上人口学最早的出现,还是从人口内在变量开始的,格兰特就是从死亡率研究开始的。

**李建民:**这些年来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理论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李竞能:**我认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应该不断更新,与时俱进。首先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否则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都分不出来,

何谈发展。我当年主编《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初衷也是要把西方人口理论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介。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具备哪些基本的原理,现在连这些东西都没弄清楚。我认为,最理想的还是应该具有比较扎实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础;对人口分析的方法和人口理论本身也有一定的素养,这样的人来搞人口经济学要好一点。那么,这也只是能够把这个学科的基本方面、基本过程和基本的原理搞得比较清楚。如果想要再进一步,还必须具备比如说系统工程、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造诣,才能够说可能有比较高层次的创新。因为人口经济学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要搞人口经济学的话,首先应该要有经济学的基础,同时还要懂人口学,否则就没法搞。我觉得这样一个要求其实也不算高。一些人的研究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对经济学的东西没有深入下去,人口学的东西也没有深入下去。特别是微观研究,如果没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包括劳动经济学的基础,很难搞下去。我认为,就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来说,首先还是应该先把人口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这两个体系建立起来,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个东西。张纯元主编的那本《人口经济学》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上进行了理论体系的建设。

李政道教授说20世纪物理学发展的特点是简化与概括,21世纪理论发展的特点是整合与统一。这对于人口经济学也是适合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既要把西方以及我国这些年来的人口经济学研究好的东西概括进来,把人家已经有的东西总结概括起来,同时还要保持中国的特点,要考虑到我国的特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然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用了,如家庭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都已经借鉴进来了。关键的问题是,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强调什么?比如制度问题,我们肯定要强化,因为制度的不同有很多的不一。此外,对于中国来说,在人口经济问题上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和经验可以吸收。经济发展就有跳跃式发展、跨阶段发展。很多东西是跨阶段发展,无论人口还是经济,都存在这种现象。所

以,往往在其他国家经历的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我们国家都缩短了。

**李建民:**现在学术界有争论,认为在外部因素作用下把有些发展过程缩短了,可能不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

**李竞能:**就我国的生育率转变来说,现在的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生育率”,不完全是“意愿生育率”。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生育率转变过程缩短了。其实,市场经济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只看到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往往注意得不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注意得不够。

**李建民:**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恰恰是在体现社会主义性质那一方面我们做的不够充分。

**李竞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理论上当然很清楚,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但如果进一步思考,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现实生活里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应该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私有经济的发展有没有极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是没有极限,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不应该有极限?如果有,极限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贫富分化在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贫富的分化有没有极限?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当然在理论上有,但实际上的极限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利己心或者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合不合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都是合法的,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似乎不能笼统地说它不合法,但在什么条件下合法?合法是否就合理?就合乎道德?

**李建民:**您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本质上是私有制发展问题,我们原来宣扬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具有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基础的。在私有制基础上生成的主要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对我国人口的变化带来什么影响?

**李竞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自主权问题。在市场经济下对人口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育抉择自主权问题。当然,个人自主权是以保证

社会生存权、发展权为前提的。

**李建民:**我们现在似乎害怕这种自主权,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自主抉择并不一定要很多的孩子。

**李竞能:**这里面有一个民主精神问题。人们过去对文艺复兴的理解有些偏差,只强调个性解放,其实应该是科学与民主,其中更关键的还是民主。

**李建民:**民主的前提是不是个人主义?

**李竞能:**本来就是个人主义,不过我们过去把个人主义丑化了。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市场经济的老祖宗——亚当·斯密早已讲过,利己心必需有利他心相伴。所以贝克尔在讲生育经济学时就强调这一点,利他心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利己心,那谁也不生孩子了。民主精神还主张在法律基础上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李建民:**就微观人口经济学而言,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个人和家庭资源如何实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这就涉及到个人和家庭的决策问题。

**李竞能:**记得在我学经济学的时候,老师教我说,经济学最重要的是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是物质资源有限,人类的欲望无穷。如果没有这个矛盾,也就没有经济问题了。不过现在已经有人提出质疑了,说有些情况下并不是资源不足,而是需求不足。所以才出现配置问题,选择性问题。第二条原则就是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任何事物都是有利害,在你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个都有利,看哪个对你更有利;如果两个都有害,就看哪个对你最轻。这也是一个经济原则。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我怎么选择呀?只有利跟害,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李嘉图的成本比较学说就不都是害,而是两个都是利,关键是哪个利大、哪个更优越。第三个原则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还表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都是经济学很重要的原则。第四个是均衡原则,如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这些原则对人口经济学来说也同样适用。除了这四个原则之外,经济学追求的目标有三个层次的变化。首先追求的是资源的最优配置,然后发现还有一个最优分配问题,现在人

们意识到还有一个最优规模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

**李建民:**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比较特殊。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主要是什么?

**李竞能:**我觉得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直到目前,或者说,直到人口零增长以前,首先还是规模问题,还是经济规模、资源规模与人口规模的适应问题。

**李建民:**为什么一定要以零增长为目标呢?

**李竞能:**因为在实现零增长以前中国人口规模还继续增长,2010年可能会达到14亿,2045年左右将达16亿。这意味着21世纪上半叶人口对就业、粮食、耕地、淡水、能源和其他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压力将继续增大,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只有在实现了人口零增长以后,才有可能谈到人口规模和结构的适度调整问题。

**李建民:**为了实现零增长,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人口政策是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您认为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关注什么?

**李竞能:**稳定低生育率的目标还是要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达到人口战略目标。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要关注。第一是稳定低生育率需要什么条件?稳定低生育率不单纯是生育水平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从物质的角度看,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另外还有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方面的变化,也要具备。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应该着力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化、社区化、家庭化和主体化。第二是实现了低生育率,实现了低增长,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许多其他问题。第三是实现了人口零增长以后,中国的人口发展应该怎么走?是否应该把低生育率继续维持下去呢?

**李建民:**您认为,未来中国的人口理论研究

应该如何发展?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李竞能:**1998年我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理论研究面临的挑战》,曾经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人口理论研究的发展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口研究的实用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既要重视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同时又要重视基本理论研究,深入揭示人口发展内在规律以及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不急功近利,更不文过饰非。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人口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国人口理论研究应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人口理论研究如果只是墨守成规,不敢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体系,必将失去生命力。三是独立从事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研究与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合理成分和先进方法的关系。四是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现代人口理论的发展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我们中国人口学者不但要立足本国实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而且应当注意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使我们的人口理论研究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世界人口研究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当前,我认为还应当注意摆正争取研究项目和实现研究战略目标的关系,有关部门应当增加对人口研究的投入,缓解资源不足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限制。

####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徐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农业粮食保障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2期。
2.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3. 李竞能、纪明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与现代化建设》,《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